

“华语语系文学”专号论文
Special Issue on "Sinophone Literature"

十九世纪末的马华离散诗学

The Poetics of Diaspora in 19th Century Mahua Literature

高嘉谦
(KO Chia Cian)

摘要

汉诗作为马华古典文学时期的重要文类, 描述了文人群体在中国境外以精粹的古典形式, 回应着流寓、移居和过境的种种离散经验。面对晚清的家国危机, 华人移民和文化播迁影响了汉诗的生产意识和空间, 同时对马华文学而言, 汉诗写作背后复杂的文化辩证和观照, 开启了马华文学最初的起源。这些流寓者的身分多为使节、官员、商人、士绅、塾师。他们留下的汉诗清晰描绘了使节与文学社群的建立、孔教与华人教育、南洋风土与地方感等重要面向。本文以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丘菽园等诗人个案为例, 勾勒出新马汉诗发展的基本谱系, 重新探讨他们如何主导了马华古典文学的离散意义。而 19 世纪末为起点的马华离散诗学, 理应是我们重新认识马华文学史的重要开始。

关键词: 离散诗学、马华文学史、汉诗、南洋、南来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up consulates in Singapore and dispatched consuls, a precedent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that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consuls represented the dispersal of

the literati clas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ir arrival in Singapore, coupled with their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literary works, gave shape to early Mahua literature. Meanwhile, consuls contributed to promot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literary learning in the region.

Following the Chinese consuls, men of letters began to travel and immigrated to the Southeast more frequently. Consequently, poetic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expatriate writers and local intellectual drew people's attention in public sphere such as the newspapers, which helped form a "gentry class". Expatriate writers and their compositions of classical-style Chinese poetry showcased the unique taste and cultural refin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is paper, I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few distinguished Chinese poets in Singapore, namely Huang Zunxian, Qiu Fengjia, Kang Youwei, Qiu Shuyuan and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ways these poets built up the poetics of diaspora and reshape the literary landscape of Mahua literature.

Keywords: Poetics of diaspora, The history of Mahua Literature, Han poetry, Nanyang, Immigration from the north

一、南来与汉诗

19世纪末期,中国使节的派驻出访、沿海商人、文人、百姓出洋谋生与迁居所生成的“南来”流动轴线,形塑了早期马华地区(主要以新加坡、檳城为主)初步的古典文学规模。这些经由南来文人组织创建的报刊、文社、私塾、文人雅集等基础的文学建制,以及他们在流寓和移居过程散见于当地报刊的诗文,见证了马华文学最初的起源。

从族裔迁徙和离散叙事的角度而言,“南来”表现了中国南方在境外的经济与劳力流动,并象征一个值得探究的文化与文学播迁的地理轨迹。随着士大夫阶层的知识群体出境南迁,晚清汉文学的视域里建立了一个以汉诗为主导的南洋地区文学社群。这批南来文人落脚新马地区,不但开启马华古典汉文学的起点,也为华人移民社会培育基础的文教人才。南来因此是马华文学最初的发展模式,直到20世纪新文学运动时期,仍旧是由南来文人建立起马华新文学传统。他们的文学和文化教养,以及自身的跨境经验,直接形塑了马华文学从古典到新文学半个世纪以来的规模。换言之,马华文学界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自独立建国以前,主要是以南来文

人作为文学生产和文学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¹ 以致种种在马华文学史引发讨论的议题，诸如侨民意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提倡本地意识、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等等，几乎都跟文人南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汉诗作为马华古典文学时期的重要文类，描述了文人群体在中国境外以精粹的古典形式，回应着流寓、移居和过境的种种离散经验。恰是这样的汉诗经验，提醒我们注意汉诗写作背后的文类意识。尤其在中华帝国走向世界，也渐进走向覆亡的现代历史情境，移民和文化播迁影响了汉诗的生产意识和空间，同时对马华文学而言，汉诗写作背后复杂的文化辩证和观照，正是理解马华文学起源时刻的一个关键层面。

因此从晚清到 20 世纪上半叶持续南来的中国文人，他们的汉诗写作既指向一个最初的中国想象与文化意识，同时经过不间断的乱离经验和在地生活的改变，南来的离散汉诗组装了主体飘零和地方感性 (sense of place) 的双重体验，表现了马华地区文学生产的精神结构。无论是短期流寓的派驻使节、过境官僚和避难政客，或长期移居的报社编辑、私塾、华校教师和儒商，他们留下的汉诗清晰描绘了一幅马华文学生产的原始景观：流动和离散的移民体验与社会生活。这些汉诗因此构成重要的境外“文库”。²

在我们熟悉的文学史写作规范里，相对文类概念上的旧体诗、古典诗，汉诗的称谓指向了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内的古典诗写作，有其域外播迁和生产的脉络。但汉诗在殖民地台湾的情境却显得复杂，成为日人与汉人之间个人唱咏和公共交际的诗歌形式，进出台湾与中原大陆内外。随着诗人跨向南洋和世界不同地域，汉诗成为境内与境外离散诗人共享的文类资源。如此一来，汉诗的命名理应跳脱“域外生产”的狭义解释，成为广泛说明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在中原本土，海外地域生产与播迁的客观现象。

从南来的角度看待马华“汉诗”，此称谓有相对中性的意义，区隔了新文学标榜的革命性处理方式——标签化的文类贬谪用语——“旧体”、“古典”。同时确认了从 19 世纪末叶以降的现代氛围下，另一种诗的生产型态和可能。而汉诗的生产不但构成了马华文学的早期发展型态，且铭刻了南来的迁徙情境和移民的落地生根。截至 21 世纪的今天，汉诗始终未

绝迹于马华地区，象征了南来脉络的马华文学生态中一种持续性的对民族文化审美意涵上文化共同体的想象。

如果南来是马华文学史一个主导性的议题，黄锦树教授对南来历史情境——乱离，进行文学史体制的反思，就显得另有深意。黄揭示“境外中文”（2006a）作为流动文学史的批注，尤其指出南来文人的文学实践，或建立的文学象征，已不纯粹只是文字、书写构成的文学史意义，而扣紧了文人自身的主体经验，“大流亡”时代的集体缩影。换言之，在传统中国进入“现代”的历史巨变中，形成了南来的动机，也内化为南来的精神结构。从南来的文学脉络思考，张锦忠教授提出“马华文学一开始就是离散文学”（2004），设定了文学史必须处理或无法处理中国南来文人生产的“海外”文本，以及如何在文学系统内安置的问题。他以“中华属性”（Chineseness）和“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作为安顿“海外”文本的判准，等于同时抛出一个难题。南来的文本到底该有多少成分的“地方感性”才足以构成在地文学的一部分，显然就有争议。晚清时期多次进出新马两地的岭南诗人康有为，创作的流亡汉诗充斥中国意象和祖国情怀（这关系着汉诗的美学规范和主体经验），却偏偏是置身南洋炎荒绝岛的忧患之作，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境外“中国文学”的地方感性，或理解这些汉诗写作对马华文学史的意义？张所提出的问题，点出了我们如何在文学史描述文本与作者，这等于反思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马华文学史系统适当的描述和安置“南来——离散”文本。因此，黄、张二人抛出的文学史与流动议题，已为建立动态的文学史视域提供了可能。

原本文人移民南下，只是中国在19世纪后半叶一个大离散时代氛围下的集体现象，却由此构成另一个新兴文学社群的发生和开展。这批南来文人的意义，当然属于一个离散文学的重要个案，间接也指出南来作为一个迁徙流动的地理概念，实际已是一个文学地理的观察。如此一来，所谓马华离散汉诗，除了直指殖民地时期的马来亚华人移民社会，及其文学生产机制，同时也是提出对马华文学史书写长期以新文学为起点的反思和辩证。

离散汉诗是我们重新检视马华文学起源时期最为关键的文本。我们藉

由诗人笔下理解他们表征现代情境下瞬间震撼的存在感、时间的急迫和文化断层的挤压，一一浮现为诗的内容，以致地理的迁徙、流亡，变成诗写入时代的重要姿态。因此汉诗的古典意象在越境写作里，难免构成抵挡现代时间风暴的隐喻式书写，相对带有一种文化的审美意味。

本文试图描述南来象征的文学播迁与跨境，以及马华古典汉诗群体的组成脉络，探讨 19 世纪末的南来作者形成的文学社群和建制，以及他们笔下的南洋书写。对照今日仍陷认同政治的马华文学而言，³ 这些汉诗人勾勒的文学地理，以离散叙事的框架，铺陈了马华文学最初的越境。

二、使节与早期文学社群

1881 年首位由中国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领事左秉隆（1850-1924）走马上任，同年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刊《叻报》创刊。使节到来，中国文人南来旅游、访友活动逐渐频繁，文人之间的诗词唱和透过报刊等公共领域流传，一个由南来文人与本地士绅共同组成的“士阶层”初步形成（相关研究详梁元生 1997）。流寓者投入汉诗写作，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教养和文化雅兴。其中，左秉隆创办会贤社，每月在报刊开出课题，公布课榜，评选优异诗文，建立一套对华人移民启蒙教化的文化机制。1891 年接任领事的黄遵宪（1848-1905）将“会贤社”改为“图南社”，眼光转向南洋风土纪录。每月课题中，关于南洋的题目就有“新加坡风俗优劣论”、“巫来由文字考”、“南方草木赞”、“新加坡草木杂诗”等。黄遵宪以“图南”社名取自庄子大鹏南飞的典故（详氏著 1892），期勉社员大兴文风，开启南国的文学天地。他超越一般流寓者的去国忧思，进一步以使节的高度，关怀华人社会的内部议题，将焦点放在华人社会的基本生存的大环境。

使节的派驻改变了南洋华人的政治环境，同时推动了当地的文化传播与文学教化。二人不但是清廷派驻南洋颇受称誉的领事官，且留下诗集。左秉隆《勤勉堂诗钞》由后人结集（1959），写于新加坡诗篇约 200-300 余首，记录了前后两次共十余年驻新生涯的见闻。⁴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1911) 收集他在南洋期间的汉诗 30 余首，数量不多，有学者指出其中若干应属返乡后追忆之作。黄遵宪是晚清时期著名诗人，这些片段的南洋形象纪录，却颇具盛名。〈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处理离散华人的生存困境——族群政治，〈新加坡杂事诗〉是一组典型的南洋风土书写。其中名作〈番客篇〉历来被视为重现华人大流徙时代的移民“诗史”，强调其以民歌形式表现 19 世纪末海外华人生活的历史情境。

〈番客篇〉细写南洋土生华人的婚礼过程和各族宾客汇聚的场面，俨然描述南洋地志。从婚宴的布置、饮食、摆设、服饰等生活日常细节展开叙事，以丰富多变的诗语言，表征了南洋诗独具特色的民间格局。诗人着眼中西元素并存、华洋杂处、族群互动，以写实的华人婚礼，描述华人移居离散的环境。透过宾客不同的行业，从渔业、海运、矿业、种植业、货殖、甲必丹等等发迹的华人，诗人笔触灵巧，写尽暴发户、投机者、资本家的不同嘴脸，已是华人拓荒史的缩影。

黄笔下的“番客”更进一步道尽“番”民身分与“客”居的现实。他不但直指清廷政府海禁政策的错误，以及衍生的乡人对归侨的剥削和掠夺：“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爨”、“堂堂天朝语，祇以供戏谑”，并同情华人异地生活的无根和边缘处境：“譬彼犹太人，无国足安托”、“虽则有室家，一家付飘泊”。尤其生存在西方势力底下的殖民地，劳动移民群体的文盲者，其终究无法表述自身的生存体验：“一丁亦不识，况复操笔削”。而识字者，也在难以归返祖国和西方权力阶级的排挤之外：“识字亦安用？蕃汉两弃却”。这深刻透露出“番”在国境内外脉络下被抛置的流离现实，“客”更非一般流寓者的“客感”、“客恨”，而是移民群体无法言及的飘零。

〈番客篇〉呈现了我们当今谈离散华人 (Chinese Diaspora) 的原初场景。于是，使节眼下“被发现的南洋华人”，是如此一幅景观：遭漠视的移民劳动群体，华人教育的匮乏、无力护侨的中国政府、壮大的西方殖民势力和优越的白人统治阶级。换言之，作为使节与诗人的黄遵宪，在晚清时刻发现了一部“华人移民史”。这些境外汉诗可以看做海外华文文学的最初概念与雏形。⁵

三、孔教与汉诗流亡

1900年两位晚清岭南的著名诗家康有为与丘逢甲南来，替南洋汉诗形塑了迥异的风貌。丘逢甲（1864-1912）是从台湾内渡广东的抗日诗人，康有为（1858-1927）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逋臣，两位名人为孤悬海外的新加坡岛，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光环及文教气息。丘逢甲在抵达新加坡以前，他的百余首诗作和文章经由当地文人丘菽园在报刊的登载与传播，丘逢甲的名气、光环与办学志向早已渗入当地知识阶层的绅商之间。此次南来还前往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各地演讲与拜访。整趟旅程由此定调为一趟宣扬办教育创学堂宗旨的文教行旅，发表多篇倡导创建孔庙学堂的文章（参见丘逢甲 1900a；1900b；1900d）鼓励了当地的孔教运动。当地华人的热烈响应和推崇，让丘逢甲感到意气风发的自豪。从两首〈自题南洋行教图〉的气势看来：

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
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
二千五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
独倚斗南楼上望，春风回处此澜生。
(丘逢甲 1900c)

诗里展现了热烈的排场所提供的文化自足。恰是这种万人听教的场景，激动诗人飘零枯竭的心境，仿佛找到了异域汉学复兴的契机。丘逢甲终于在自我建构的汉诗与文教空间里窥见理想，渡海实践诗与文的寄托。从保教保种到兴学，当地移民所追求的文化身分安顿与确立，为丘逢甲的教育事业，拓展了意想不到的文学空间。

同年，流亡中的康有为则是接受了丘菽园的邀请，从香港来到新加坡避难，开始了他在新马地区的流亡生活。作为戊戌政变的出亡者，他前后出入新马的次数要比晚清其他流寓南洋的文人更多，留居时间相对也长。⁶他在南洋创作生产的汉诗，足以组成他已出版诗集的三卷。这阶段的汉诗内涵，基本笼罩着一种深沈的创伤意识与帝国想象。戊戌变法时他

走在帝国前端，变法失败后他走在帝国境外，他自诩为帝国维新之师，却又只能在绝域流离喟叹。他惊恐无奈与忐忑不安的壮志抱负，在诗里化成一股郁结的气象：

天荒地老哀龙战，去国离家又岁终。
起视北辰星暗暗，徒图南溟夜蒙蒙。
乱云遥接中原气，黑浪惊回大海风。
肠断胡琴歌变征，怒涛竟夕打滕艚。
(康有为 1996a)

他将流亡状态以诗赋形，同时“记史”。从宫廷斗争联想海天塌陷，海路所见都是耸动意象——天荒地老、星暗暗、夜蒙蒙、乱云、黑浪，排山倒海的压迫感，早已置个人于流亡的大潮。诗的气势磅礴，笔力惊人，铺张典故寄寓复杂的中原想象。尽管去国离家久远，帝国的流亡者并没有偏离核心，“北辰星暗暗”和“南溟夜蒙蒙”清楚对照君臣之间的距离和处境。他的君国情感，塑造了独特的流亡文化地理。

康有为流亡于新马期间写作的汉诗格局，基本环绕在圣君与帝国之中。于是当清廷再次传来“伪嗣之变”，令他心焦如焚，忧愤难耐。他的诗已是为“史”而抒情言志，诗题直言“君国身世，忧心惨惨，百感交集”。一个帝国的通缉犯，亡命之际竟百转千回的顾念圣上与国体，他的流亡已不纯粹铭刻个体乱离，而投向集体的中国灾难。

当他避难于森美兰和马六甲两州边境的丹将敦岛 (Tanjung Tuan)，在海边拾木之际，依然展示了惊人的巨大历史志向。

断木轮囷弃海滨，波涛飘泊更嶙峋。
他时或作木居士，后万千年尚有神。
(〈丹将敦岛拾古木甚嶙峋，题诗其上〉 121)

他从弃置的古木想象有朝一日可以刻成木头偶像，在千万年后供人膜拜的神灵。这当中曝显了他对功业与自我学说的不朽追求，甚至隐含一种宗教性质的“教主”渴望。他 19 岁乡试落第，拜服孔圣，发愤读书之际，

早有“以圣贤为必可期”⁷的抱负。民国以后宣扬“尊孔”为立国精神，更直言“吾少尝欲自为教主矣”（详康有为2007：206），强调要在孔子之外自为教主的原始欲望，因无法攻破其学问转而尊孔。亡命之时，他的“教主”情怀，隐然牵动了他在南洋宣扬和发起的孔教运动。

在此期间，康有为作为中国孔教运动创始者的光环，自然对南洋的华人兴学产生巨大效应。他在各地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华侨兴学，却成功推动新马和印度尼西亚新式华人教育的诞生。这是南来知识分子浪漫的诗学想象，也含有传播孔教的使命与热情。他们作为华人文化教育的精神指导，建设了南洋早期华教的格局和规模。可以确认的是，康有为亲身参与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和马来亚尊孔中学的设立，如同他在诗里的激昂表述：“与君北洒尧台涕，剩我南题孔庙碑”。⁸因为戊戌出亡，让他有了在南洋的建树文教的机会。个中悲凉的情调，藏有流亡心思，却精确描述了华侨社会文化教育的现实。

另外，康有为有诗：

华夏文明剩竹枝，南洋风物被声诗。
 蛮花馥鸟多佳处，恨少通才作总持。
 中原大雅销亡尽，流入天南得正声。
 试问诗骚选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
 （节引〈题菽园孝廉《选诗图》〉117）

他以南洋异域地景为竹枝词的最佳素材，其实暗示了帝国崩毁，文化塌陷之际，诗的礼崩乐坏就是大雅销亡。诗的正声不在雅乐，而是国风的民间魅力。跨出境外的诗人，因此放逐天南，以民间歌谣形式重建诗的质感与动力。在他看来，屈原的放逐诗学，为流寓者汉诗写作的整体精神贴上了标签。康有为由“王者师”变成亡命逋臣，绝域反而形成诗的生产条件，他的感触尤其深刻。因此他游历爪哇，就忍不住高歌：“中华士夫谁到此，我是开宗第一章”（〈游爪哇杂咏〉）。他有“史上第一人”的新奇与使命，显然已自觉的意识到自身的流亡是具体的现代经验，已非传统的流放与避地可以比拟。

四、南洋风土与地方感

然而，离散视域并不当然指向怀乡意识，也不只有文化忧患。在远离中原之外，不断辩证的中原与南方绝域的地理距离，其实已渐进改变汉诗的感性结构。诗人每一回抒发对中原的乡愁，又再一次标示自我跟中原时空的远离，而此间地理空间乃主导了自我定义与抒情的秩序。因此，汉诗的离散意义从流寓者到移居者的笔下，逐渐有了一些转移。

相对短期过境或流寓的文人，以“星洲寓公”自嘲而终老于新加坡的丘菽园（1874-1941），一生为马华文学留下一千余首诗作。他有“南侨诗宗”之誉（程光裕 1977），也是康有为、丘逢甲眼中最具才华的南来诗人，前后出版了两部诗集《啸虹生诗钞》（1922）、《丘菽园居士诗集》（1949）。1896年23岁的丘菽园移居星洲继承父亲庞大遗产，投入当地文教建设和鼓吹风雅。他创办丽泽社，提供和鼓励了当地文士才人进行文艺创作和投稿的机会，开启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当时丽泽社在报刊公开征稿的杂咏诗题，就有“星洲竹枝词”、“粤讴题”。⁹在星洲杂感部分，不限散文骈体诗词，题目都跟当地生活场景相关如“打球场、旌旗山、博物院、自来水汇、公家花园”¹⁰等。以民间歌谣和竹枝词形式，撷取当地题材，丘在南来初期已建立自己的在地视域和眼光。

此外，他创办《天南新报》（1898-1905）、承顶《振南日报》（后易名《振南报》）（1913-1920）参与中国境内的政治议题，接济政治流亡者康有为、容闳、梁启超等，资助庚子勤王。同时联系当地土生华人开办女子学堂，¹¹推动新马地区的孔教运动。丘菽园以文人品味及文化资本积累而成的文学空间，最大的意义在于建构了一个中国、台湾、香港与南洋区域之间的汉诗人交游的网络。他透过宴饮酬唱、诗文互通的叠错网络，呈现文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感受。尤其丘清醒意识到南洋乃绝域炎荒：“……不堪荒服外，犹自滞归程。采访存民俗，知交惜死生……”（参丘炜菱（菽园）1977a）。因此丘菽园主导的文学实践，或建立的文学场，不应只视作个人事业。他收集和出版流寓文人作品，藉由公共资源，召唤和描绘一个离散的文学想象，为大时代中短暂易逝的流离感受，以及境外汉

诗的生产环境，保留一个南方的文学谱系。

从1924年起始的三年间，丘菽园在新加坡创办了“檀榭诗社”。他主持诗人文酒雅集活动，曾以〈星洲杂感〉为题聚众唱和。其中我们看到离散异地的移居者，他们穿越乡愁与在地生活的想象感触，呈现一组带有异域风情，飘零的中原想象和迁徙大历史的境外“史诗”记录。

半坠疎霞暑渐残，海风吹袂月飞天。
笙歌灯火楼台夜，车马烦嚣市肆边。
一岛独当欧亚道，重洋犹获太平年。
真看四海为家日，民族华离过万千。

楼船渡海便移家，冠盖人文岁有加。
聊受一廛居外国，每依南斗望中华。
波涛阅历诗翻壮，生计艰难俗尚奢。
剩有故乡清物在，偶烹活水试新茶。

点染丹黄叶似花，赏心叠见好风华。
一年温暖天全美，百族辛勤力可嘉。
道有运输来海陆，物无遗弃到泥沙。
交通更觉惊神速，贱价人人坐汽车。

（〈星洲杂感〉其一、二、三）（丘菽园编1926：18）

上述三诗出自当地著名医生诗人黎伯概（1872-1943）手笔。他描绘新加坡做为华人流寓地的发达热闹场面。诗中不见浓烈乡愁，反而展示外部世界的地理视野。星岛是欧亚水路交通的要冲，繁华的发展建设景观，其实更能表现安居于此太平世界的生活感觉。尤其深入纪实当地社会状况，陆续写作的长诗〈己未、庚申间，星洲米贵恐慌，百年未有之厄〉、〈市变欧战罢后，星洲土产落价，牵连商业倒闭无数，经二年余，尚未恢复原状，亦奇变也〉（许云樵编校1977：24-26），已摆脱流离目光，摇身为史家之笔，让诗贴近南洋风土，全面呈现流寓深耕于斯的在地感。因此，境外汉诗纪录的离散经验，多元铺陈了移居者经历的新世界在地变迁，四海

为家的新兴体会。诗人黎伯概所谓：“廿年时事看迁变，闲惜流光负寓公”（〈星洲杂感〉），大体已是南洋移民的时代感遇。

无论流寓或移居，处身异地所衍生的家国和民族认同，复杂也无奈。曾任《叻报》主笔的李铁民（1895-1956），他的〈星洲杂感〉直陈无法回避的语言冲击，强调迁徙移居者有了新的在地认同，仍有长居于此的文化断层忧虑。

群岛旌旗拱此方，声明端合冠南洋。

剧怜航海鸕夷客，多把他乡作故乡。

果然鸚鵡巧于言，竟把佉卢教子孙。

为语汉秦都不识，分明渔父入桃源。

（〈星洲杂感〉其一、二）（李元瑾 2001：20）

“他乡作故乡”道出落地生根的离散终站。“渔父入桃源”则巧妙将移居者面临的汉语文化断层，以自我调侃的笔调诠释为逃避战祸而躲入桃花源的际遇。不过，这或许也印证 1920 年代中国境内战端未停，内乱动荡，移居境外者未尝不是寻找桃源避难的心态。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汉文化教育遭遇西方强势语言文化的威胁，是共同面临的经验。李铁民以汉诗记录移居者的现代忧虑，或离散现代性经验的语言和文化感受。延续千年的汉诗形式，竟走到异域新世界的前端，将复杂的迁徙者感触，做了不同层次的心理描写。汉诗与境外的对话关系，由此有着巧妙的呼应。

诗人对在地经验的深入刻画和描写，在一定程度丰富了离散诗学的内涵和特质。其中移居而终老新加坡的丘菽园，诗集里留有不少状写“星洲”，特别以“星洲”命名的诗篇。¹² 他着眼南洋地域的生存感觉，写作风月纪闻、异族妇女的习俗，带有文人风流趣味。除了写作官能风土的游戏之作，他也特别杂揉南迁历史脉络，为星洲找到自身的书写位置，突显出他不同于一般流寓者的眼光。然而更能具体展示汉诗的境外生成意识，还是诗人投入书写乱离体验与异地生存的种种文化冲击和在地生活的关怀。丘菽园曾以清丽淡雅笔触描写移居者落地生根的现实情境，无形之中

延续了黄遵宪早期“迁流或百年”（〈新加坡杂诗十二首〉）的观察，并进一步从自己的华商身分出发，体验他乡遇故知的共鸣。这不但丰富了离散汉诗的乡土感觉，也拓展流寓者汉诗创作的基本关怀。

旧雨椰风外，连冈橡叶青。相逢尽华商，移植到南溟。
乡土音无改，人间世几经。安闲牛背笛，吹出自家听。
（〈移植〉）（丘炜菱（菽园）1977b）

造林增野辟，筑坝利车行。榛莽卅年易，芳菲百里平。
山低无飓患，舟集有潮生。烽火惊乡梦，侨民渐学耕。
（〈岛上感事四首〉之一）（丘炜菱（菽园）1977c）

透过丘菽园深入观察南洋地理的人文风貌变迁，汉诗呈现出南洋从洪荒之地，变为建设有成的移民社会。只是末联一句“烽火惊乡梦”，让读者看到诗人隐藏的情绪张力。移民城市景观的变化，对照原乡丧乱动荡。移居者所把握在地感，凸显在现实的“侨民渐学耕”。他们成了回不了故乡的广义遗民，只好在异地重建自身的文化教养。对照前一首的诗题〈移植〉，人的迁徙其实是根的移植。诗的言外之意似在强调：他乡重逢不是偶然，而是新生活的开始。丘菽园的观察显然透彻，这些张扬南洋地方意义和特质的汉诗面目，已非一般流寓者的猎奇目光。所谓诗的地方色彩，在丘菽园身上已深化为在地生活感。

本文检视 19 末至 20 世纪初期的马华离散诗学，透过重要个案的简要描述，勾勒出新马汉诗发展的基本谱系，并试图从南来与离散的历史情境，解析南来在汉文学播迁的视域内，凸显的文化想象和文学地理，并重新思考马华文学史置于离散诗学的可能意义，藉此凸显马华古典文学在东亚汉诗与汉文学系统内的重要位置。我们透过探究南来汉诗的生产，见证了马华文学史流动的可能，并为马华本土性的探勘提供一个历史纵深的参照。而 19 世纪末为起点的马华离散诗学，理应是重新认识马华文学史的重要开始。

注释

- 1 关于南来文人和马华新文学史的发展议题，已有部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史料整理。参见郭蕙芬 1999、林万菁 1994、骆明总编 2003。其中林、郭二人将南来作者研究断限在战后 1949 的新中国成立之年。骆明编辑的资料则直接将时限拉到新加坡独立建国的 1965 年，在新华文学独立切割出来之际，以南来作家作为马华文学最为关键的组成社群。古典文学部分，唯一的成果参见李庆年 1998。
- 2 南来文人与马华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详李庆年 1998。该书对当地报刊的部分作品与文献做了重要整理。
- 3 对此议题的重要讨论，参黄锦树 2006b。
- 4 左秉隆驻新时间共有两次，分别为 1881-1891，1907-1910。相关讨论详陈育崧 1983、柯木林 2007。《勤勉堂诗钞》只进行体例分类，未做系年，故对其写于南洋的诗篇判断也有出入。其中李庆年统计约 318 首，何奕恺统计则是 241 首。对照整本诗集的篇数，写于南洋之作已占 4 到 5 成。数量如此庞大，历来讨论者却不多。关于李、何二人的统计，详李庆年 1998：96-98；何奕恺 2009。
- 5 关于左秉隆和黄遵宪使节汉诗里对南洋华人观察和想象，详细讨论参见高嘉谦 2010。
- 6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考证，康有为前后进出新马地区的次数高达 7 次。主要停留据点是新加坡和槟榔屿。他分别在 1900、1903、1904、1908、1909、1910、1911 年多次停留，时间长短不一，停留时间最久的长达一年半以上。详张克宏 2006 制作的年表，页 101。
- 7 康有为虽皈依孔子学问，但跻身圣贤，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壮志已见：“于时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皈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康有为 1999：6）。
- 8 这首诗有康有为的小注：“君与仙根再三创孔庙学堂于南中，后余贻书陆佑卒成之，今为尊孔学堂”。这也是目前矗立吉隆坡的独立中学“尊孔中学”的前身，参见康有为 1996b。
- 9 见〈丽泽社十二月课题〉，《星报》1898 年 1 月 5 日。
- 10 见〈乐群文社冬季题目〉，《星报》1897 年 12 月 15 日。
- 11 关于丘菽园及当地土生华人（又称峇峇华人、海峡侨生）的合作及互动，可以参考李元瑾 2001。
- 12 这样的诗篇不少，如〈新加坡地图〉、〈星洲〉、〈星洲纪遇〉、〈星洲谣〉、〈星岛〉、〈星洲晚眺〉等。

参考书目

- 陈育崧 1983。〈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椰阴馆文存》。新加坡：南洋学会，121-127。
- 程光裕 1977。〈南侨诗宗丘菽园〉。《星马华侨中之杰出人物》。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89-123。
- 高嘉谦 2010。〈帝国、斯文、风土：论驻新使节左秉隆、黄遵宪与马华文学〉。《台大中文学报》。32：359-398。
- 郭蕙芬 1999。《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何奕恺 2009。〈左秉隆《勤勉堂诗钞》中南洋之作考〉。《南洋学报》63：131-146。
- 黄锦树 2006a。〈境外中文、另类租借、现代性：论马华文学史之前的马华文学〉。《文与魂与体》。台北：麦田，79-104。
- 2006b。〈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论马华文学的创伤现代性〉。《中外文学》34：8、175-192。
- 黄遵宪 1892。〈困南社序〉。《叻报》。1892年1月1日。2003：383-384。
- 2003。《黄遵宪集》。吴振清等编校。天津：天津人民。
- 康有为 1996a。〈己亥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铁君、同富侄、汤觉顿赴星坡，渔舟除夕，听西女鼓琴。时有伪嗣之变，震荡余怀，君国身世，忧心惨惨，百感咸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12。
- 1996b。〈庚子正月二日避地星坡，菽园为东道主。二月廿六迁出他宅，于架上乃读菽园所著赘谈，全录余《公交车上书》，而加跋语，过承存叹，沧桑易感，亡人多伤，得三绝句，示菽园并邱仙根〉。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15-116。
- 1999。《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7。〈参议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3-206。
- 柯木林 2007。〈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石叻史记》。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74-80。
- 〈乐群文社冬季题目〉，《星报》1897年12月15日。
- 李庆年 1998。《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元瑾 2001。《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响应》。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丽泽社十二月课题〉，《星报》1898年1月5日。
- 梁元生 1997。〈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士」阶层之分析〉。《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9-30。

- 林万菁 1994。《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
- 骆明总编 2003。《南来作家研究资料》。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 丘逢甲 1900a。〈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天南新报》3月27日。2001：820-822。
- ____ 1900b。〈吧罗创建孔庙学堂缘起〉。《天南新报》5月8日。2001：823。
- ____ 1900c。〈自题南洋行教图〉。《天南新报》5月22日。2001：470。
- ____ 1900d。〈纪邱工部逢甲大霹雳埠演说：四月初一日〉。《天南新报》6月4日。2001：823-827。
- ____ 2001。《丘逢甲集》。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长沙：岳麓书社。
- 丘菽园编 1926。《檀榭诗集》。新加坡：不详。
- 丘炜萋（菽园）1977a。〈寄酬邱仙根四首〉。《菽园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51-52。
- ____（菽园）1977b。〈移植〉。《菽园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428-429。
- ____（菽园）1977c。〈岛上感事四首〉第一首。《菽园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424。
- 许云樵编校 1977。《名医黎伯概先生诗文集》。新加坡：中华书局。
- 张锦忠 2004。〈重写马华文学史，或，离散与流动：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张锦忠编《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埔里：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55-68。
- 张克宏 2006。《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